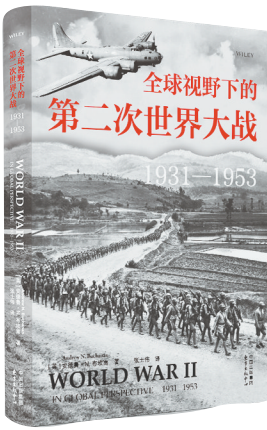




打破西方叙事偏差

全球分量 重新阐释二战中国战场的



今年是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包括中国学者在内,全球各地学者进行了许多全新的研究,并出版了一系列著作。

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的《全球视野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1931—1953)》一书,站在全球视角,将二战史研究重点扩展至以往常被忽视的亚洲、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展现世界各国共同反法西斯的历史。该书作者将二战时间框架扩展至1931年—1953年,高度肯定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破除“欧美中心论”,展现全球视野,受到史学界的高度关注与充分肯定。

近日,“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举行。该书作者、美国佛蒙特大学历史系高级讲师安德鲁·N·布坎南首次来华,在参加会议期间,接受了湖北日报全媒体记者专访。同时,记者连线正在美国访学的该书译者、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张士伟教授,聆听全球视野下,中美两国学者对中国二战贡献的思考。

为何1931年是关键坐标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于何时何地?学界对此一直有争议,在该书中,布坎南明确提出1931年是二战的开端。

共同参与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名誉会长胡德坤表示,这也是该书新的突破。受冷战影响,西方中心论长期主张,二战是以1939年德波战争爆发为起点的。这就意味着自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发动侵华战争开始至1939年9月德波战争爆发前,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中国和欧洲、非洲等地区遭受侵略的国家进行的反法西斯斗争被忽略了,这是极不公平的。而该书作者认为,从1931年日本人侵中国东北地区开始,就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十分鲜明地体现了作者的全球视野。

胡德坤认为,该书对中国抗日战争给予了高度肯定。布坎南认为,就战争本身而言,亚洲是二战的主要战场,无论过去西方对于亚洲战争持有怎样的偏见,它在规模上都足以与其他战场相提并论,而且在时间上也比其他战场更持久。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视野下,将1931年作为二战起点是合适的。

一些发生在中国的战役被严重忽视

以往,有些西方国家通过历史虚无主义、双重标准与话语重构等手段

操控意识形态和舆论宣传,刻意淡化、扭曲甚至篡改中国在二战中的历史贡献,试图通过曲解历史叙事来动摇战后国际秩序的正义根基,以延续其全球霸权地位。

历史不能亵渎,真相不能歪曲,记忆不能抹杀。张士伟认为,历史不仅承载着对过去的记忆,更是构成当代国际关系的价值认同基础与公平正义国际秩序的精神支柱。二战的胜利成果凝结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主义基石,构筑起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坚持正确二战史观,汲取其中的历史智慧和力量,对于维护世界和平、坚守国际公平正义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张士伟表示,这也启发我们中国学者,要破除西方中心论,以档案为基础的实证研究非常有必要,也最有说服力。

张士伟认为,1931年到1945年,中国战场有无数可歌可泣的抗日故事,无论大会战还是地方反抗,都沉重打击了日军气焰。应加强地区抗战史料收集与整理,如东北义勇军抗战、冀中平原游击战为代表的根据地抗战、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建与江南游击战、1939年南昌保卫战等。通过深入挖掘抗战事迹,向国外学界推广,让其了解中国抗战及真正的中国。

如何让中国抗战史印刻进世界记忆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主战场来看,中国人民在1931年以后的10多年时间里,以一己之力顽强抵抗日本侵略者,支撑起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亚洲

主战场。在抗日战争中,中华儿女前赴后继、勠力同心,付出了3500多万军民伤亡的巨大牺牲,有力配合了盟军在其他战场的作战,也为苏联避免两线作战提供了重要支持。“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率先高举武装抗日的旗帜,倡导并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领导中华民族彻底打败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二战胜利作出重大贡献。

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在二战中的贡献被国际史学界边缘化。布坎南认为,这种历史抹除是西方二战史学漠视东亚的表现。

张士伟说,过去20年,西方对中国在全球反法西斯战争中角色的认知经历重大变革。如今,西方学界已无法再将中国视为孤立无关的战场。随着中国重回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中国在全球政治和经济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这是西方学者和社会更感兴趣探讨并正视中国二战经历的重要原因之一。当务之急是将学界的研究成果推向社会、政界及教育界,改变西方普通民众心中根深蒂固的偏见。

张士伟认为,中国学界和社会各界应当加强合作,把中国基于档案实证的研究成果推向国际,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抗战故事,增强中国二战声量。要有意识地推动中国与西方历史学家定期会面、实地探访、交流思想,让外国学者更直观理解中国抗战的重要意义。

并且,还要加强中外历史教育交流,推动国外历史教科书加强对于中国抗战的叙事,从根本上铲除污蔑或无视中国抗战、美化侵略叙事的国际传播载体,让中国抗战的史实更加深入人心。

大家谈

品读刘楚昕获奖小说《泥潭》

时代洪流下的人性幽光



近日,“90后”作家刘楚昕凭借小说《泥潭》荣获漓江文学奖虚构类奖项。《泥潭》以辛亥革命武昌首义为背景,以荆州地域为舞台,不大处落笔去展现波澜壮阔的宏大场景和史诗般的历史脉络,而是在《泥潭》的开篇,即让小人物的亡灵成为主角,絮语交织,悲切凄冷。整部小说描绘了一众小人物在历史缝隙和社会激变中的生存状态与精神困境,其非线性叙事方法所呈现出的独特风格、先锋意识和现代派的文学技巧,令人耳目一新。

窥见普鲁斯特的影子

《泥潭》的叙事结构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以旗人前军官恒丰、革命党人关仲卿和神父马修德为主角。第一部分,采用亡灵恒丰第一人称的多头叙事,现实与梦境重叠,超我与亡灵交汇,潜意识与多重人格意识闪回的手法,展现其家族悲剧和死亡结局;第二部分,以第三人称聚焦革命党人关仲卿的革命活动,以现实主义笔触刻画其复杂性格和心理状态;第三部分,转换成神父马修德的第一人称,以日记和书信为载体,回溯命运,填补空白,使一众人物形象完整丰满。

三个部分既独立成章,又相互印证,内在相关、气息相通,串联后可拼凑出一幅完整图景,给人“原来如此”的感觉。

小说大量运用意识流、闪回和“超我”对话等现代主义技巧。如“我看见我……”的多重自我叙述,既增强了文本的虚幻感,又揭示了人物的心理矛盾。

多重视角中,“死亡”和“逃离”贯穿全篇。左都统恒龄自杀,留学生沉海,恒丰、恒好等人死于非命,关仲卿、楚卿等人的逃亡,既为命运和结局需要,更承载旧秩序瓦解、新势力迷茫及个体渺小无力的寓意。

或许我们在《泥潭》中可以窥见普鲁斯特等文学大师的影子,但其独树一帜的结构,彰显了刘楚昕不容忽视的文学特质。

避开宏大历史叙事

《泥潭》避开宏大历史叙事,采取非英雄化书写,聚焦于社会边缘人物。三个部分的主角在社会生活和政治舞台上都非重要人物,即便关仲卿后来成为善后司司长,上了袁总统功勋名单,作者仍往细处小处落笔。

写关仲卿心思缜密、体弱多病、信念坚定,不贪占、不结盟;写黎元洪、黄兴等大佬,仅三言两语写其平庸鲁莽,不渲染异象。不搞情节铺垫和高潮,只保留冲突和细节,便足以体现时代气息和内心情状。

对习惯现实主义作品的读者来说,第二部分是最无阅读障碍的,它将第一部分中不起眼的关仲卿作为主要人物,且成了全书体量最重的部分。

三部分叙事手法虽变,但对人物内心的细腻描绘和现代主义气息一脉相承,对善良与卑劣等心理活动的表达,充满洞察力、人情味和感染力。

通过小人物塑造,小说展现了彼时社会、民族、阶层冲突,描绘人物复杂关系、生命本质和人性幽光。

荆州人文地理若隐若现

小说以荆州为地理坐标,虚实结合地呈现出荆州的背景。承天寺、玄妙观等城市地标和毗邻地名多次在小说中出现,作者却又不驻足于风物景致,符合作者聚焦人性而非地域的创作意图,合理而自然。

荆州水域遍布,沙市依码头而生,形成了沙市人安土重迁的思想和自满精致的习性。小说中关仲卿是沙市人,他的身上除了旧文人的共性外,也不难看出沙市人的脾性。

《泥潭》主人公是虚构的,历史人物如恒龄、连奎、唐牺支、马修德等却是史料中真实存在的。相比其他荆州本籍作家的同类题材作品,《泥潭》的历史空间更为广阔,人物及活动场域更多,创作手法更丰富多姿,人物形象更细腻真实。

总之,刘楚昕的小说《泥潭》是一部具有深刻社会洞察力和独特艺术风格的作品,其文学手法、艺术特点及主题的深刻性均值得文学界深入探讨,他的获奖实至名归。

(作者:彭定旺,中国作协会员,荆州市作协副主席。)



安德鲁·N·布坎南
历史系高级讲师
美国佛蒙特大学
本书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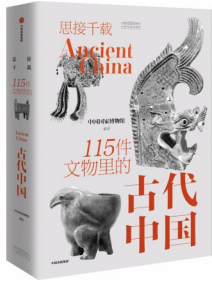
张士伟教授
历史学院
武汉大学
本书译者

实习生 谭玲
湖北日报全媒体记者 文新

好书撷英

《思接千载:115件文物里的古代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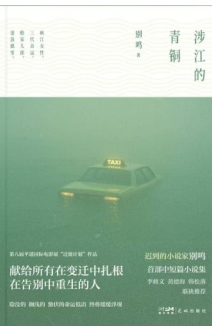
中国国家博物馆 编著 中信出版社



本书从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基本陈列中精选115件文物,通过解读文物背后的故事,系统呈现了中国百万年人类演进、一万年文化积淀与五千多年文明传承的发展脉络,勾勒了中华文明延续不断的历史轨迹。

《涉江的青铜》

别鸣 著 花城出版社



这本书是一封写给沉没故土的情书,也是一辑记录峡江儿女的生存画卷。作者用冷冽的文笔,演绎了这片土地上小人物的漂泊与扎根往事。

重读《武汉沦陷史》 感受正义力量

□ 侯培和 杜凯文

翻开《武汉沦陷史》,一段浸透着血泪与抗争的城市记忆徐徐展开。这部由涂文学、刘庆平等专家学者历时五年编纂的厚重著作,以73万字的恢弘篇幅,从城市史视角系统梳理了1938年至1945年武汉沦陷时期的悲壮历程。该书不仅填补了抗日战争中城市史研究的薄弱环节、空白地带,更以翔实的史料与深刻的洞见,让我们读懂一座城市的精神品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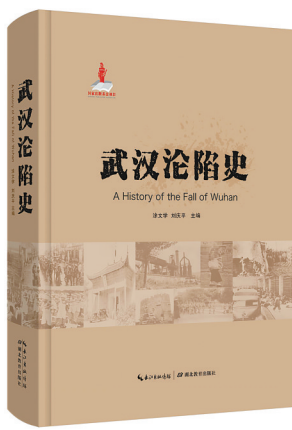
1938年10月25日,日军铁蹄踏入武汉,这座明清以来便以繁华著称的都市,沦为焦土。工业基础毁坏殆尽,社会经济全面崩溃,人口锐减。然而,正如书中所揭示的,武汉人民从未屈服。从伪汉口维持会会长计国桢被民众刺杀的自发反抗,到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20余支游击队在敌后燃起抗日烽火,这座城市的抵抗从未停歇。《武汉沦陷史》的价值,不仅在于还原历史真相,更在于其独特的研究

视角。编纂团队耗时五年,辗转武汉、南京等地档案馆,抢救性挖掘出原始档案、报刊社论、时人日记等稀缺史料,打破了以往抗战史研究“重军事轻社会”“重宏观轻微观”的局限。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曾评价该书“视野宽阔、视角多元”,正是因其跳出了单纯的军事叙事,转而关注市政管理、经济结构、文化教育等城市肌理的变迁,让读者得以窥见战争阴影下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与精神坚守。这种“以城观史、以史见人”的研究方法,为当代城市史研究树立了典范。

尤为深刻的是,书中对武汉城市韧性的剖析。抗战胜利后,这座城市凭借交通优势与百年商埠的商业基因迅速复苏:1946年人口恢复至92万,1948年突破116万。涂文学认为,武汉由于其交通地位和商业属性,在战争结束以后,往往能够迅速修复,市场再度繁荣,这在中国其他城市中是非常少见的!

重读《武汉沦陷史》这本书,它时

旧书新知



刻提醒我们:一个城市的真正价值,不在于高楼大厦的多少,更在于其人民面对苦难时的精神品格。从1938年的抗战焦土之城,到2025年的创新发展之城,武汉用近百年时间书写了一部关于韧性与复兴的史诗。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这座城市正以“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精神,在现代化新征程中续写属于自己的传奇。

(第一作者侯培和,为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政治史等方面研究。)